

乡土人生

赵树理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灵芝根据她自己那种错误的想法来找爱人。

便把文化放在第一位。

三里湾去过中学的男青年。

只有一个有翼还没有结婚。

因为村里的交通不便。

又和从前的男同学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只好把希望放在有翼身上。



精选集

世纪文学名家

步士人生

张其成 著



逝水無聲

附送集



赵树理精选集



赵树理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精选集 / 赵树理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
(2009.4 重印)

ISBN 978 - 7 - 5402 - 0472 - 3

I. 赵…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54 号

责任编辑:姚晓华 里 功

赵树理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 × 1000mm 16 开 18 印张 33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200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中国农村变革的史诗

董大中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作家里面的一个异数。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他把“为人民”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艺术追求，他对理想的执着和农民式的求实精神，都使他笔下的文学世界具有一种在其他作家身上很难见到的品格。他的作品忠实地描写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表达了中国农民痛苦的呻吟和深情的呼唤。他也就成为农民的一位最忠实、最勇敢、最可靠的代言人。

一

赵树理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闭塞落后又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山区农村，又正逢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倒塌、人类现代文化如春风一样横扫中国大地的時候。

赵树理于1906年9月24日（旧历八月初七）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此地自古属泽州，历来跟上党盆地来往密切，深受上党一带粗犷、倔强、富有斗争性的民风所影响。祖父信奉佛教，为“三教圣道会”的信徒。赵树理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用一些儒佛相混的口诀和礼仪教他，什么“遵王法，敬父母”，什么“不说假话，不欺暗室，不履斜径”，祖父还规定用豆子每天做善恶之行的记录。这一切，使赵树理从小就养成实事求是、反对虚伪的诚实品质。在生活上，他的祖先虽给他留下了一座高楼大院，但在他出生之前，家道已经衰败下来，以至他幼年、童年都经受了靠借债度日的艰辛。他的故乡是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可是受苦受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家就有不少。有人过着向人乞讨的生活，有的“因为没有好地种，坏地产量太少，无心受苦，改学梁上君子，结果被族里人打了个半死埋了”（《新食堂里忆故人》，《赵树理全集》第5卷）。“有一户姓冯的，父子两代都没有一垄地。孩子名叫福归，我称哥哥，也是在外讨饭被饿死的”，后来写小说《福贵》，“有一部分就是他的生活”（同上）。穷人们缺少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却很富有。住在附近的吕家四兄弟，爱好民间音乐，村里八音会的乐器长期存在他们家里，赵树理便经常到吕家去听

音乐,学唱上党戏。不要乐器的时候,乡亲们就讲故事、说笑话,俏皮话连成串,赵树理称这是他的“初级语言学校”。这就是赵树理出生和长期生活的环境。父老乡亲的苦难生活情景,时刻萦回在他的脑际,促使他思考着原因,寻求着答案,梦想着彻底改变它。民间艺术的熏陶,又为他把艺术和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需求联系起来做了纽带,为他以后在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上的追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如果赵树理一直生活在那个名叫尉迟村的小村子里,他的人生道路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永远是个“野小”——小农民。幸运的是,1925年夏天,已经十九岁的赵树理,被朋友说服,到长治考取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里有着全新的文化。学校订有许多新书报,图书馆里陈列着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林琴南的翻译,还有《小说月报》等大型杂志可供随时借阅。更重要的是,赵树理结识了王春、常文郁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同学。王春是阳城人,小两岁,却高两个年级。赵树理刚到学校时,依然坚守着祖父教导他的一套,执行着“太阳教”的教规,不吃肉,敬惜字纸,见到有字的纸,就烧成灰,扔到河里。王春开始奚落他,以后跟他辩论,每次赵树理都输。赵树理的唯心主义被王春的唯物主义打败了。他先前对著有《四书白话解说》的“江神童”十分崇拜,每日早起,都要面对着“江神童”的照片,正襟危坐来读,数年不断。现在王春取代“江神童”,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他称之为“王先生”,做什么也要向“王先生”请教。常文郁是晋城人,从小立志干革命。考入长治四师后,常先加入国民党,以后秘密加入共产党,又介绍王春和赵树理先后加入共产党。另一方面,赵树理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从图书馆里的新书报中他广泛地阅读了各种文化知识,初步接受了个性解放和人人人生而平等的新的价值观。《小说月报》是他最喜爱的读物,他从《小说月报》上读了许多外国小说和戏剧作品,特别是易卜生的剧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日本农民作家菊池宽的各种形式的作品。直到晚年,他还能够成段背诵契诃夫小说的片断。“五四”时期提倡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对赵树理也有很大影响。有人把赵树理当作“农民作家”,这是很不妥当的,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只是不是一般知识分子作家,而是有独特经历和个性的知识分子作家。有人只看到赵树理身上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也是很不妥当的,其实赵树理接受的人类现代文化并不比一般人少,只是他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融化在自己的血肉里,跟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解。1927年初冬,由常文郁、王春、赵树理等“十代表”领导的长治四师学潮取得胜利,赵树理代表全体同学在欢迎新校长大会上讲演中,要求新校长把北京大学的新文化带到上党来,便说明了他对新文化的积极追求和热情呼



唤。赵树理能够把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当作他写作的总主题,就跟人类现代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分不开。在道德和家庭伦理上,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可能要强烈一些。

1928年初,“四一二政变”的黑风刮到上党大地。在常文郁被捕之后,赵树理听从“王先生”王春的苦苦劝告,两人相偕,离开了学校,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并因而脱离了共产党,住了国民党的“自新院”,成为他一生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其生活经历和职业选择而言,这将近十年的“萍草生涯”对赵树理能成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和语言大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将近十年,他沉没在人生最底层。他曾被一伙人劫持,以至得了像狂人那样的“迫害狂”,在病情略有好转后他投水自杀以求解脱,幸亏被救,才得以活命。他长期过着“一不升学,二不找事,三不回家,四不参加党的组织”的“四不”生活,其间在太原的电影院门前看过自行车,为了挣一碗饭吃当过电影演员,还在一家饭店当过厨师,打过烧饼。他看到了各种人性,尝尽了酸甜苦辣。他那种宁可在饭店当厨师、在电影院门前看自行车也不当中学教师的性格,有力地表现出,在赵树理的人性天平上,“上等人”和“下等人”是颠倒的,他倾向于“下等人”而鄙视“上等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始终把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如何,把他们的尊严和地位是否得到改善放在心上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这也是他最容易接受上海革命文艺队伍提出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主张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将近十年里,赵树理有较长的时间,是作为一个闲人,住在山西教育学院的宿舍里当寓公,以卖文为生。正好那一时期,上海文艺界展开了大众化的讨论,赵树理一直关注着上海的讨论,他积极赞成鲁迅和瞿秋白的意见,并撰文呼应。他自己在长治四师读书时,受“艺术至上主义”的影响,把欧化当作追求的目标,后来感到这样的东西“父老乡亲”不会接受,深受触动,在1930年写的七言旧体诗《打卦歌》的最后,特别加了一个《附记》,说他这样写是要“试试难易”,标志着他文风变革的开始。在上海两次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影响下,赵树理真正树立了大众化的创作思想。他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这一年创作和开始发表长篇小说《盘龙峪》,作者的大众化风格便已基本形成。

赵树理就以这样的独特个人资本走上了文学之路。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赵树理当时还在太原,



大约于八九月间回到长治,加入“牺盟会”,正式参加了革命。以后他就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一直在宣传部门。这为他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文艺,或说从事用文艺手段动员老百姓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从中国社会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这只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生产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改善。相反,广大农民群众依然生活在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里,由于受到地主和军阀官僚以及帝国主义等多方面的残酷剥削,生活水平反而不如以前。显然,中国社会极需要进行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共产党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闹革命以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重任,走上了抗日最前线。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就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人民一方面进行抗日斗争,一方面开展各项民主变革。赵树理用他的笔,写出了根据地人民的变革和变革中人民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

从参加“牺盟会”到写出《小二黑结婚》,有五年多时间。这是赵树理用各种通俗作品“占领封建文化阵地”的一个时期,也是他对“通俗化”、“大众化”进行理论探索和实验的一个时期。在赵树理看来,大众化并不是要“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而是担负着“普及文化、提高大众”(《通俗化“引论”》,《赵树理全集》第4卷)的严肃政治任务。为了“普及文化”,就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老百姓越欢迎,它所起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提高大众”,就要用新的思想、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所描写的生活,就要排除旧的意识,就要把老百姓“引导”到新的生活中来。即使运用旧形式,也要对它进行变革,赋予它新的生命,不能陈陈相因。这是赵树理“大众化”的起点。周扬说赵树理的大众化是“新颖独创”的,就在于它不是在旧瓶里装新酒,而是经过了改造。这样,赵树理所描写的根据地人民的变革生活,就具有一种全新的风貌,能够激励读者,使作品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作为一名文学大师的奠基之作,1943年春天写出,9月出版,随即改编为多种戏剧形式演出。当年根据地的变革,是逐步展开的,也是从老百姓切身利益入手的。婚姻自主是众多变革中的一项,它最受青年男女欢迎,也容易引起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小说中着重塑造了“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落后人物的形象。“二诸葛”是真迷信,他是旧的婚姻制度的维护者。“三仙姑”乃是一个对旧的婚姻制度极度不满又找不到正确反抗道路的旧式妇女的被扭曲了的形象。她的装神弄鬼,跟“二诸葛”算卦有很大区别,那是她苦闷的象征,她在装神弄鬼时讲“米烂了”,恰恰说明她并不相信那一套,那只不过是她的一种反抗形式罢了;她的悲哀在于,她本是应该赞成新的婚姻制度的,却



成了反对者。站在这两个落后人物对立面的小二黑和小芹,是响应民主政府提倡婚姻自主的青年一代的典型。最后两个青年胜利了,新的婚姻制度在根据地扎下了根子。这篇小说以其所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成为赵树理描写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一块里程碑。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在对待地主剥削农民上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不是消灭那个阶级。赵树理从多方面表现了这一变革,有在会上进行说理辩论的(《地板》),有把抗日跟“除奸斗争”以及对剥削阶级的改造结合起来描写的(《李家庄的变迁》),有写生产度荒的(《孟祥英翻身》),还有写旧衙门的狗腿子是如何仗势欺人的(《催粮差》),等等。《李有才板话》是那一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缩影。它以阎家山为背景,展现了两个阶级、两种势力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和激烈性。比起《小二黑结婚》来,它的主题深刻多了,形式也完美、完整多了,避免了《小二黑结婚》最后由区助理员把两人拉到一起的生硬做法。李有才作为一个“板人”,既是生活的参与者,也是生活的旁观者,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作家的化身。他有强烈的爱和恨,但他却以一副客观冷静的观察家的身份,看着生活之流如何激荡向前,同时又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关键时刻,用自己的快板创作,把他的意志,把他的爱憎情感表达出来。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写出了阎家山年轻一代农民民主意识的苏醒和他们勇于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革命精神。民主,并不是进步文人的专利品,即使那些没有受到过现代文化熏陶的山村普通老百姓,当他们在权势者的压抑下深感无法主宰自己只能受人宰割时,他们也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发出“管理有我一份”的呼声。从自己人中选出村长来,是这一代年轻人的自发要求,它像狮吼一样震得大山摇晃,使阎恒元一伙真确地感到末日来临。这是赵树理前期小说的高峰,是《小二黑结婚》合乎情理的自然发展。《福贵》是这一时期另一篇值得关注的小说。它深入到人性层次。主人公一生经历了“由人变成鬼”和“由鬼变成人”的两个过程,后来在冬学的一次会议上理直气壮地向族长老万质问:“我不要你包赔我什么,只要你说,我是什么人!”真是振聋发聩的一声。“人是什么”,“我是不是个人”,是人的自我解放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一步,赵树理在《福贵》叙事中写出这么有力的一句,乃是他自己人性观念在胸中发酵的必然表现。《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前期创作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史诗一样的小说,它用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极俭省的笔墨,展现了北方人民抗日斗争的全过程。斗争之复杂,抗日之惨烈,人物成长之合乎自然,都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国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时矛盾的性质变了,针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也随之改变,由土



地改革取代了先前的减租减息。描写这一变革的主要有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和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是描写土地改革的,它们正面展开了土地改革的全过程,从发动农民到分配果实,无不写到。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却不是正面展开,它截取了生活的一角,围绕着小宝和软英的爱情,在人们的日常闲谈和你来我往中,写出各种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土改过程是在人物背后隐约显示的。对话是这部小说描写人物的主要手段,跟《地板》一样,能使读者从对话中想象出人情世态,惟妙惟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民俗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思想的挖掘上,这部小说值得注意的,是探讨了像小旦那样的投机分子如何形成,给予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一项正确的变革行动被这类投机分子破坏,是革命中常有的事,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或见而不敢写。赵树理写出来了,而且是用批判意识写的,这表现了他的“卓见和勇敢”(周扬语)。这部小说发表以后,在当年《人民日报》上受到了长时间严厉的批评,被指为“歪曲现实”,“抹杀了”党在农村的指导作用,等等。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赵树理的独异之处及其深刻性,也预示着赵树理在未来的日子里也会有他自己独到的发现。《田寡妇看瓜》跟《福贵》的主题相似,表现了穷人们在翻身之后扬眉吐气的精神面貌。这篇小说不到一千字,却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所写两个人物给人的印象很难忘掉,是短篇里的精品。侧面描写农村新面貌的,还有《小经理》,跟《小二黑结婚》同一主题、描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还有一篇《登记》,是1949年进入北平以后写的,引起很大轰动,被改编为几十种地方戏曲在全国各地上演。

由于赵树理的创作生动地表现了根据地人民所展开的各项伟大斗争,由于赵树理的创作完美地解决了文艺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赵树理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1947年七月底至八月初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举行的会议上,与会者“着重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一致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见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从此中国文艺家有了“赵树理方向”。

在20世纪40年代,也可以说从赵树理参加抗日战争起,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民族主义大义,跟根据地所施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发展符合他的理想,他的愿望,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实际上是他心灵的赞歌,是从内心深处喷涌出来的,它们呈一元化的契合。反映土地改革的



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受到严厉的批评,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常人不会选择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对土地改革本身有不同的看法。这里表现出赵树理创作思想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不是一味歌颂成为现实的东西,而是深入到现实的表面之下,看看它是否可靠,存在哪些“隐患”需要注意,需要克服。赵树理说:“《邪不压正》,写土改后期(平分土地)一个流氓乘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在老区土改总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这篇是一九四八年太行新华书店与晋察冀新华书店合并时在平山写的,就是为了提醒这一问题,使结束土改时不上他们的当。”(《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这就是赵树理的现实主义。赵树理后来把他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乃是他对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最好说明。这篇《邪不压正》就是一篇“问题小说”。再前,即使最有名的《李有才板话》,也不能不说有“问题小说”的影子,那篇小说的章工作员的工作作风就成问题,后来老杨同志纠正了章工作员的工作作风,阎家山的斗争才走上正确道路。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赵树理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跟四十年代相仿,是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正面表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主要作品便是长篇小说《三里湾》,《三里湾》出版以后,这个阶段也就大体上告一完成,时间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建国以后农村的重大变革,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重大变革,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先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转变为高级社。对这一新生事物,赵树理思想上曾经有过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并一度得到毛泽东的首肯。1951年八九月间,中央为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先召集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在华北区的小白楼举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据说毛泽东点名务必请赵树理到会,因为他最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的心理和愿望。赵树理在会上一反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农民在斗倒地主以后并不急于走合作化道路,而是要先使自己富足起来。主持会议的陈伯达非常反感,批评赵树理思想右倾,但汇报到毛泽东那儿以后,毛泽东却说赵树理的话有道理。在随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



来”，指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据说就是接受赵树理意见修改的，增加了“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内容。事后合作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以前还只是进行试点，以后就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了。赵树理曾经参加过山西十个试点社的试验，在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他写了这部长篇，这也是我国作家所写的第一部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但是就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赵树理心目中的合作化应该是什么样子。三里湾人们的热情很高，这是因为合作社实行的是“大包干”，跟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相似之处，并不是“一大二公”的那种合作化。因为在赵树理看来，这样的合作化虽然不如单干对农民有刺激性，但总比把土地全部收回来要好得多，所以他还是给予了肯定和赞美。

进城以后，赵树理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回到晋东南跟他的老熟人们“共事”。他熟悉他们的心理和愿望，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随着合作化运动的不断高涨，他同时看到许多新的问题冒了出来。1956年夏，“有人从沁水县嘉峰乡（按，尉迟村即属嘉峰乡，两村相距只有二里）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便于8月23日给长治地委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信中特别指出：“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他们“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赵树理全集》第5卷）这封信，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人过得像不像人，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是不是得到保障，赵树理始终在关注着。他看到一些干部“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就坐不住了，以这封信要领导加以改进。据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知道，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极左思潮，以后愈演愈烈。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极左思潮的必然表现。赵树理以他跟中国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以他执着的求实精神，对极左思潮是非常反对的，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8年冬，赵树理担任阳城县（当时沁水县合并于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那正是虚夸风冲昏了人们头脑的时期。赵树理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反对“高指标”，反对“放卫星”，闹得其他领导人没有办法，便把赵树理打发到尉迟村所在的公社去“蹲点”，实际上打入“冷宫”。赵树理并未停止跟极左路线的斗争。1959年在彭德怀写出“万言书”的同时，赵树理也写出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万言书”，通过陈伯达，上送中央，结果换来一连几个月的批判。这个“万言书”的



总的意思,是正确认识现阶段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领导只要管路线、方向就行了,对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完全可以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对农民的自由干涉得太多了,必然使农民左右为难,生产反而不能搞好。这是他那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的总主题在政治上的表现。

赵树理对极左路线的斗争,必然会在创作上反映出来。他先写了一部反映20世纪40年代革命斗争生活的长篇评书《灵泉洞》(1958,未完),以后又写了《老定额》(1959)、《套不住的手》(1960)、《实干家潘永福》(1961)、《杨老太爷》、《张来兴》(1962)等文。《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两文是针对着虚夸风写的,他用两个实干家的形象对那种害人的不实之风做了鞭挞和讽刺,可称为他自己所说“顶风文学”的典范之作。《杨老太爷》和《张来兴》跟《灵泉洞》有相似之处,都是写过去革命斗争生活,在赵树理这样主要写当前生活的作家来说,应该算是“历史题材”。他之所以回到过去,就因为现实使他感到苦闷,使他不满意,这既是解脱,也是“从旁边顶了一下”,也还是“顶风文学”的路子。写于《灵泉洞》之后,《老定额》之前的《“锻炼锻炼”》,是赵树理后期创作的高峰,可跟1943年的《李有才板话》相媲美。这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说,它以生活主流的“整社”为背景,把多种人性、多种生活现象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多彩的人生画面,教人玩味无穷。“小腿疼”和“吃不饱”是两个受批评的人物,但“吃不饱”却正是现实的高度概括;社员“偷”花(指棉花),不是社员要“偷”,而是社干部“导演”着去“偷”,然后把“偷花贼”捆起来,威胁“送法院”,“干”与“群”成了一种猫与鼠的关系;杨小四等人是“整风”的骨干,也就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英雄人物”,然而他那种做法却被支部书记说成“有点开玩笑”;支部书记显得可有可无,其实那是一个极其深沉、极富隐喻性的人物。这个文本的丰富内涵,随着时间的流驶,将会被未来的读者更深入地解读。这几篇小说,有的艺术性差一些,可是其思想性是无法估计的。在那一时期的中国文学里,这是一组绝无仅有的珍稀品。读到这里,人们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赵树理方向”?这的确值得深思。“赵树理方向”是一个政治性术语,是党的政治路线在文艺上的具体化,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相悖离。比如在“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时候,你作家所写的,只能是歌颂“三面红旗”,而不应该相反,否则就不是应该坚持的“赵树理方向”了。放在他人身上,那个“方向”可能跟其主人的创作道路相一致,但就赵树理本人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就是赵树理自己的创作并不符合“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是“为人民”写作的,他把“为人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当时的文艺却是“为政治”的。赵树理的高贵,赵树



理的伟大,就在这里。这也使他的小说,把描写农村变革和表现农民的真实状况及思想,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真正的真实,不是虚假的真实。

那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化很快。“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接着提出“防修反修”,开展“四清”运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在文艺上还有批判“三十年代”,批判“中间人物”,扫除“帝王将相”等等。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面前,许多人都如堕五里雾中。赵树理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物,在以“大跃进”、“高指标”、“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极左时代, he 可以从“数”上跟你较真,你说一亩地必须施多少肥,他说像你这样做,庄稼长成栽绒毯子,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下,使你无言可辩,只能把他放到一个生产队去蹲点。现在面对这个口号,面对这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赵树理没了办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不能不学习党的新的理论,还要遵守党的纪律,即使自己想不通,也要服从。从1963年以后,赵树理放弃了“顶风文学”的写作,而是想着跟上党的步伐。他先写了《卖烟叶》,把一件很普通的小事提到“投机倒把”的高度,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那个名叫贾鸿年的年轻人就犯了路线错误而受到惩处,而他之所以犯错误,又因为他喜爱文学。这跟写于《张来兴》之后的《互作鉴定》鞭挞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是一致的,喜爱文学成了一些人的错误之源。以后赵树理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并以四清为题材,写了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作者的本意是写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如何激烈,然而现实生活提供给他的原材料太贫乏了,他找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力证据,只好把搞副业等说成资本主义,十里店也因而变了颜色。这个剧本的主题是强加上去的。赵树理毕竟是赵树理,他在拔高剧本主题的同时,也把农村生活真实的一面烘托了出来。王东方和他母亲是本剧的主角。这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是过去地主阶级的剥削造成的,但在解放以后十几年还把他们的贫困归罪于受到剥削和压迫,就使人无法信服。每次这个剧本演出,当东方母唱到像他们这样的贫下中农现在仍只能以萝卜充饥的时候,总是迎来一片掌声。主角马红英唱“为什么他一直穷到今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值得人们深思。

回顾赵树理建国后十七年的创作,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前进的步伐是如何向前迈的,也可以看到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和他们心里是如何想的,这是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很难看到的。从艺术上说,这十七年的创作有种种不同情况,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它们的一个共同特色是,那都是赵树理深思的结果,是他从内心抠出来的。它们表现了一个真实的作者。

正当赵树理汗流浹背地跑着要赶上党的新理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



了。积过去多年之经验,每场政治运动到来,必先从文艺界开刀。对此,赵树理自然明白,所以运动开始后他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哪知运动越搞越“深入”。他先是被当成“周扬文艺黑线”上的“黑干将”和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受到公开点名批判,所有作品被一概否定。以后“纠叛徒”声起,赵树理的“历史问题”本来早已弄清,不算怎么一回事,可是在极左路线下,黑的也会被说成白的,赵树理被迫害而死就有其必然性。倒是赵树理在运动之初所写第一份“检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最后几句话值得深思。他说:“……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候,再被检点。”(《赵树理全集》第5卷)他相信社会自有公论。公正地说,赵树理一生创作虽不丰富,一些作品也未达到应有艺术高度,但能把20世纪40年代到“文革”之前中国农村巨大变革如此深刻、如此真实地反映出来,把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痛苦和挣扎,把他们的心声和愿望如此真切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在极左时代不受极左影响敢于写出“顶风文学”来,除了赵树理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为赵树理感到自豪。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三闲居



目 录

中国农村变革的史诗	董大中 1
-----------------	-------

中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	3
李有才板话	14
李家庄的变迁	42
“锻炼锻炼”	118
套不住的手	132

长篇小说

三里湾	141
-----------	-----

创作要目	董大中 266
------------	---------

(本书目由董大中选定)

中短篇小说

